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 年第 1 期　　(总第 240 期)
中国童蒙文化笔谈

秦汉童蒙文化的特点与研究视角

张小锋

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童蒙文化之风悄然兴起,俨然已成为"显学",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魅力再次彰显的表征,也是历史学、教育学、民俗学等学科交叉融合而催生的新的研究领域,其学术价值和镜鉴意义不可小觑。秦汉童蒙文化在中国童蒙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深入探讨秦汉童蒙文化的基本问题,对带动和提升童蒙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至关重要。

一、秦汉童蒙文化的特点

与历代相比,秦汉童蒙文化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确立为秦汉童蒙文化生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确立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治国思想、文教政策、选人机制等无不影响到童蒙文化。秦朝享国虽浅,但其统一文字、尊崇法家、以吏为师、"焚诗书"等政策,深深地影响到这一时期的童蒙文化,也重塑着秦帝国的国民性格。秦统一之前,私学盛行,不同主张、不同学派的诸子思想竞相生发,各国教育内容无法统一,教学手段和方式也因人而异。秦统一之后,出于巩固统一和塑造秦帝国的国民意识之考虑,严禁私学,实行思想文化钳制政策,除"博士官所职"外的"《诗》、《书》、百家语者"一律烧毁,"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①]同时还在最基层的乡一级设置三老,专门"掌教化"。这里的教化,不仅是对成人而言,童蒙教育也理应包含其中。需要说明的是,秦人十分重视书法和识字教学,不仅仅是为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更为深远的考虑是为了促进和巩固文字统一、强化秦帝国的文化认同。

童蒙教育的发展与综合国力和经济水平息息相关。汉初,由于经济凋敝、百业待兴,几代君王虽均实行"与民休息"政策,意识到偃武修文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心有余而力不逮,"未皇庠序之事"。直到武帝时期,驷马强盛,财有余力,此时的汉王朝"劝学兴礼,崇化厉贤"[②],不仅"立太学以教于国",而且"设庠序以化于邑"[③],建立了一套遍及全国的童蒙教育体系。西汉末,王莽虽篡汉自立,仍不废教育。刘秀本人出于太学,喜好读书,纵使战争闲暇也"手不释卷",《后汉书》卷 79《儒林列传》记载:"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东汉建立后,刘秀尤重教育,"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起到了上行下效的示范

收稿日期:2017 - 10 - 12

作者简介:张小锋,男,甘肃宁县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029)

① 《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 255 页。

② 《汉书》卷 88《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3594 页。

③ 《汉书》卷 56《董仲舒传》,第 2503 页。

④ 《后汉书》卷 40《班固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 1368 页。

作用，一时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④的盛况，这自然而然促进了童蒙教育的发展。

第二，秦汉童蒙读物质量高、影响大，童蒙教育思想甚为丰富。童蒙读物是进行童蒙教育的凭籍和“拐杖”。《汉书》卷30《艺文志》记载，秦代的童蒙读物有《苍颉》《爰历》《博学》，分别由丞相李斯、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母敬编撰，字体采用秦篆。汉初，闾里书师将《苍颉》《爰历》《博学》三篇合并为《苍颉篇》。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汉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西汉末扬雄作《训纂篇》，东汉初班固继扬雄后“续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据《隋书》卷32《经籍志》记载，东汉时期，编纂蒙学读物者还有贾鲂、蔡邕、朱育、项峻等人。秦汉童蒙读本的编纂者均为当世名臣硕儒，他们不仅博学多识，文采斐然，而且思想观点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完全合拍，确保了帝国思想向社会基层的渗透和蒙学读本的质量。与此同时，《论语》《孝经》等传世的文化典籍也扮演了童蒙教材的角色。秦汉童蒙读物对后世影响深远，如《急就篇》自汉而后，长期流传，《北齐书》记载李绘、李铉等人都曾在幼时学习过《急就篇》，历史上著名学者唐人颜师古和南宋王应麟先后为它作注，颜师古《急就篇注叙》中说：“至如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学之。”可见，直到唐代《急就篇》仍然被广泛使用。

秦汉时期留下了诸多关于如何搞教育、如何开展“童蒙”教育乃至“胎教”的真知灼见。汉初政论家陆贾建言刘邦，不能以“马上”治天下，只有加强文教，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受到高祖的称赞；叔孙通采用儒家礼仪，建立了汉帝国正规的朝会制度，使刘邦真正感受到皇帝的尊贵无比。此时，素来鄙视儒生的刘邦对读书人态度发生了转变，叔孙通“诸弟子儒生”全被封为郎官，读书人从此日益受到朝廷的重视。汉文帝时期贾谊多次上疏，论述秦亡汉兴的原因，大力倡导儒家仁义学说。他告诫为人父母要重视孩子的童蒙教育，主张“绝恶于萌芽，起教于微妙”；贾谊曾先后担任长沙王、梁怀王太傅之职，他的童蒙教育思想更多地通过如何教育好太子而表达出来，疾呼早期教育和教育环境的重要性。汉代大儒董仲舒认为，教育就要为国家大一统政治服务，他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明师、兴太学，重选举、广取士的三大文教政策，对武帝政治乃至整个汉帝国的长治久安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德育思想和教学思想丰富而系统。东汉初思想家王充的毕生心血《论衡》，不仅是一部阐扬唯物主义思想的力作，也是总结和升华其教育实践和思想的宏著，其中关于教育若干重大问题的论述，启人深思。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万物之贵，在于有智慧和知识；教育能陶冶儿童，改变人性，培养人才，发展才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思想和创见，对包括童蒙教育在内的汉代乃至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秦汉童蒙文化中道德教育居于首位，家风家训引人瞩目。秦汉时期道德教育的内容不尽相同。秦朝重法制、尚军功；汉代推崇德教、察举征辟选才、以“孝”治天下。晋文先生指出：“经学作为官方文化，不仅成为汉代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且推动了学校教育的迅速发展。”①在经学中，《论语》《孝经》被放置到一个“或且超过五经”的地位。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每年十一月，“命幼童读《孝经》、《论语》”。汉元帝为太子时，十二岁即可通《论语》《孝经》；范升少孤，年九岁，通《论语》《孝经》等等。可见研治《孝经》不仅是汉代“举孝廉”的重要途径，《孝经》又是教化人民的典范教材，出现了包括童蒙在内的“天下人诵《孝经》”的社会现象，童蒙只有先读《论语》《孝经》，然后才可学习“五经”，优异者可进入仕途，跻身上流社会。汉代“尊师而重傅”、研习“五经”之风、尊老慈幼之气浓。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童蒙文化，既有长足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环境；反过来，童蒙文化的发展又促进良好社会环境和社会风尚的形成。

秦汉的家风家训引人瞩目。有学者指出：两汉时期是我国传统家训的定型时期。这一时期，儒学逐渐占据独尊地位，儒家礼教得到重视，随之产生了家训、门风、家声等概念。② 在历史长河中众多家训“俱往矣”，文献中载记的仅是只鳞片爪而已，如西汉孔臧的《戒子琳书》、刘向的《戒子歆书》、东汉马援的《戒兄子严、敦书》、郑玄的《戒子益恩书》、汉末诸葛亮的《诫子书》等，都是千古流传的佳作。这些家训情真意切，说理透彻，不仅是指导子嗣们立身处世的圭臬和良训，而且是影响当代和后世人们“修身”、“齐家”的

① 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② 徐少锦：《两汉时期的家训》，《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5月23日第6版。

精神财富。秦汉时期，涌现出诸多世代赓续的大家族，如弘农杨氏、扶风班氏、博陵崔氏等家族，英才辈出，灿若星河……这些家族薪火相传、历经百代，均与其良好的家风传统有很大关系。

第四，秦汉时期太子教育和女童教育呈现新面貌。太子作为"储君"，其素质高下关乎国运民福。秦汉时期历代帝王均把教育太子列为头等大事，慎选师傅，精心栽培，形成了严整的专门教育太子的制度规范。皇室勋贵和上流社会对子嗣的童蒙教育，也极为重视。《后汉书》卷10《皇后纪》载，东汉和帝皇后邓绥"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有学者指出："邸第"就是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机构；不仅如此，它还是世界上最早的幼儿教育机构[①]，匡正了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婴幼儿教育机构的陈说。事实上，汉代的年幼君主及妃后颇多，他们虽贵为至尊，但因其年幼，心智尚未成熟，需不断训导；故此，少年帝妃的教育也颇受重视。

汉代女童教育极具特色，自幼习仪规、受典训、善《史书》、诵经典的女子，屡有记载。这一时期，出现了针对女子的训诫教育，如东汉的邓禹"闺门之训，可为后世法"。刘向首撰《列女传》，成为东汉以后"闺训"的主要教材；班昭著《女诫》，亦为后世通行女子教材，前者以具体事迹为典型作为施教内容，后者侧重于讲道理和提出原则和规范，二者相辅相成。《女诫》自唐代起被列入《女四书》之首。[②]

第五，秦汉时期童歌童谣颇为流行。童歌童谣是儿童游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童蒙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子今先生对汉代的儿童游艺考证精微，指出有掩鹊、捕蝉、戏钱、蹴鞠、鸠车之乐、竹马之欢、战争游戏、博弈等，此外还有观"百戏"、模仿成人生活、弹射飞禽[③]，这些儿童游艺，多为后世承袭。

汉代的童歌童谣，不惟儿童喜欢传习，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如《史记》卷8《高祖本纪》记载高祖还乡时，曾"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史记》卷24《乐书》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汉书》卷22《礼乐志》载："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汉武帝时"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汉文帝时有民歌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汉武帝时有歌谣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汉成帝时有童谣曰："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王莽末天水有童谣曰："出吴门，望缇群。见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更始时南阳有童谣曰："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建武时蜀中有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顺帝末京都有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童歌童谣不仅是了解秦汉童蒙真实生活的重要依据，也是反映秦汉政治生活、民众心态的有益史料。秦汉童歌童谣中不乏隐刺皇帝皇后不当行为、抨击政治黑暗、鼓噪政权更迭者，这些看似妄言不道的"童谣"，竟被统治者"容忍"或"默许"传唱于世，并载入史册，这是两汉童谣不同于其他时代童谣的显著特点，也是两汉童歌童谣颇为流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秦汉童蒙文化的研究现状与新视角

关于秦汉时期的童蒙教育、儿童生活及相关领域，学者已有研究，但是将"蒙学"、"童蒙"、"儿童"作为具体研究对象者，除王子今《汉代儿童生活》（2012年）、郭炳瑞《两汉童蒙教育研究》（2013年，硕士论文）外，其他论著并不多见；在研究中使用"秦汉童蒙文化"这一概念并深入探究者寥寥，足以说明秦汉童蒙文化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看，也折射出秦汉童蒙文化研究的困难和艰巨。制约秦汉童蒙文化研究的因素主要有：史料的制约、理论的困乏、视角的固化、研治者动力不足等。

① 冉苒：《中国古代初期无婴幼儿教育机构说质疑》，《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② 施克灿：《中国教育通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251页。
③ 王子今：《汉代的儿童生活》有详细论述，可参看，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

开启秦汉童蒙文化研究的新征程，需要研究者转换新视角。

一方面，充分利用且善于运用新出土材料。无庸讳言，史载不足、资源匮乏是制约秦汉童蒙文化研究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地下出土资料时有披露，为秦汉童蒙文化研究送来缕缕清风。陈寅恪先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①]可以说，谁掌握了新材料，谁就占据了秦汉童蒙文化研究之主动。（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出土，大大丰富了秦汉童蒙教育的内容。通常认为，秦汉童蒙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识字教育，算数教育不纳入其范畴。这种观点经不起仔细推敲。如果说，不将算数纳入童蒙教育的范围，试问，算数能力是从何时开始培养呢？秦汉童蒙教育通常在15岁以下，如果说一个人要等到15岁才开始学习算数知识的话，不太符合情理。桑弘羊因"精于心算"而于13岁入侍宫中。显然，桑弘羊童蒙时代就已经接受算数教育。湖南岳麓书院藏秦简《数》、里耶秦简中惊现《九九乘法表》，说明秦人重视数学知识。张家山出土汉简也有《算数书》，内容丰富，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事实上，秦汉时期存在多种类型的数学著作和抄本，如此普遍的数学著作和抄本，不可能全是为成人而准备。今观《九九乘法表》，简洁实用，不惟成人可背诵，儿童照样可诵读学习，由此可见，《九九乘法表》等算学知识是秦汉童蒙教育的内容之一。（二）汉简中屡屡发现的《仓颉篇》《急就篇》残简以及大量习字简，为汉代童蒙识字教育提供了佐证。《仓颉篇》《急就篇》是秦汉时期重要的童蒙教材，但是它会在多大范围使用却语焉不详，今出土于西北边陲居延、肩水金关、额济纳、敦煌的汉简以及长沙东牌楼汉简中关于《仓颉篇》《急就篇》的残简和习字简，虽不甚完整，但发现频次高，可视作秦汉时期童蒙教育遍及全国的有力旁证。（三）众多的出土画像和碑刻墓志资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汉代童蒙世界的认知。翦伯赞先生称汉代画像石为雕刻在石头上的"绣像的汉代史"。据学者统计，迄今为止，已发现和发掘汉画像石墓超过两百座，汉画像石总数已超过一万块，其中不少还是刻有文字的题记画像石。汉代的画像现象普遍而流行，如汉武帝晚年曾"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以昭示霍光和群臣，汉宣帝曾于麒麟阁画赞十一位辅佐大臣，汉明帝曾画赞云台二十八将等。汉代画像内容丰富，带有明显的教化功能。尤为重要的是，汉廷尊孔崇儒重教，屡为孔子及儒生画像，2015年发掘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墓中发现了西汉宣帝时期的孔子及弟子画像，同时还出土大量竹简，包括《论语》《易经》《礼记》《孝经》等文献；东汉灵帝于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汉画中不乏"孔子见老子"画像石、文翁讲经画像砖、官学讲经画像石、伏生授《尚书》图等，有的"孔子见老子"的画像石，不仅出现孔子的弟子，还出现了神童项橐。这些资料透射出汉代尊儒重教之风，甚至某些图像本身就是类似今日主题展览馆之类的教育资料，这些无疑是了解童蒙文化的重要资料。

另一方面，转换新视角，采用新方式。秦汉童蒙文化资料在传统典籍中犹如草蛇灰线，少之又少。但仍有一些典籍资料，我们对其认识和挖掘还不够。譬如，秦汉时期"神童"不少，如"圣童"张堪、"神童"杨乌、"奇童"杜安等等。以往学者往往只关注神童本身，却忽略了神童诞生的家庭教育因素，如法律天才张汤堪称神童，学者只关注他的天赋异禀，很少关注他的父母对其成长的教育。事实上，没有张汤的父母在其身上倾注的大量心血和采取恰当的教育方式，就不可能出现后来的早慧儿童张汤。可以说，每一位神童的出现，都是其父母或家族在教育上倾注大量心血的有力注解；每一位神童的成长史就是一部鲜活的童蒙教育史，也是同时代和后世家庭用来教育子女的生动素材和典型范例。又如，汉代的画像资料，研究者往往关注其文字信息，甚至试图将图像资料转换成文字信息，但却忽略了图像本身的教育功能。事实上，画像资料不仅是对文本史料的重要补充，更是对教育活动更切近历史样貌的真实描述。当然，我们还需注意，历史研究重视史料，"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是许多历史事实并不一定都能记载在文献中，我们不能因为"文献不足征"，就否认其历史事实发生过，秦汉童蒙文化正是如此。所以，我们既要尽力地掌握更多资料，用史料说话，也要科学运用逻辑推理，用理论分析来阐明史实。

（责任编辑：仲平）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